

辜
鴻銘文集

岳
麓
書
社

7
216.2
6

辜鴻銘文集

四庫全書

岳麓書社

一九八五年·長沙



011067

•

辜鸿铭文集

冯天瑜 标点

责任编辑：王荷亚

•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

198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80,000 印张：3.5 印数：1—1,200

统一书号：11285·57 定价：0.79元

辜鴻銘文集

冯天瑜标点

岳麓书社

一九八五年·长沙



前言

辜鸿铭（一八五六——一九二八），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厦门。父亲为马来亚华侨，辜鸿铭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十岁随父英人布朗赴欧洲，先后在英、德就学，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士工科文凭，后又游历法、意、奥诸国，深悉欧洲语文、政艺。一八八〇年回槟榔屿省亲，随即奉派在新加坡殖民政府供职。此间接触由法国回来的马建忠，得闻中国文化，遂辞去殖民地职务，蓄发留辫，弃西装革履，穿长袍马褂，闭门攻读中国经籍。中法战争期间（一八八五）归国，应两广总督张之洞邀，入其幕府，任洋文案、主办秘书、翻译及礼宾诸务，颇受张之洞器重。张之洞自两广总督至湖广总督（包括两次暂署两江总督）的二十余年间，辜氏一直相随左右，知张之洞及晚清政局甚深。

辜氏精通英文，兼晓德、法、希腊文字，又熟知西方政事社情，由张之洞、周馥推荐，参加同英法等国谈判议约工作，被视作外交奇才。清末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任命辜鸿铭为外务部员外郎（故辜氏自称“辜部郎”），又晋升郎中，擢左丞。一九一〇年，清廷赏给他文科进士，辛亥革命后，辜仍效忠清室。张勋复辟，辜被列名李经羲内阁的外交部次长。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因辜氏通晓英国文学，聘其为教授，让他在英文门研究所主讲英诗。晚年受日本聘请，辜前往讲授东方文化，数年后归国，不久病卒。平生著作主要有《读易草堂文集》和《张文襄

幕府纪闻》。

《谈易草堂文集》成书于一九二二年，蒐集辜氏清末民初所写奏章、书简、文章共十二篇，分内外篇，罗振玉作序。内篇七，阐述辜鸿铭保守的政治观点。反对维新变法，维护封建纲常，是这些文章的主旨。外篇五，介绍欧洲政治制度和社会风俗；其立论虽然迂阔，但作者毕竟游欧十余载，见闻真切，故所评介的欧洲史事社情基本准确，有助于当时国人了解西方政艺风俗。辜氏在外篇《英将戈登事略》中，对这位镇压过太平军的殖民主义军官，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这表现了他反对人民革命的反动立场。

辜鸿铭历来被视作“怪人”。当晚清之际，他在拥护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每每对朝政发表尖锐批评，从当朝重臣、顶头上司，直至皇帝太后，莫不被他奚落，故时人称其“好辩，善骂世”^①，他也自知“赋性疏野，动触时讳”^②。由于他的这种狂放孤傲性格，虽然学识才干均属上乘，却在清末政坛始终“屈抑在下”^③。民国成立后，辜氏以清朝遗老自居，始终拖着一条细细的花白辫子，还自诩为“菊残犹有傲霜枝”。辜氏在北大任教期间，力主尊孔读经，宣扬尊王尊孔“大义”，与新文化运动抗衡。一九一九年，他写过一篇题为《反对中国文学革命》的文章，攻击文学革命是可笑的，伪善骗人的；同年，又写《留学生与文学革命》一文，担忧归国留学生会在一夜间摧毁传统文化^④。总之，晚年的辜氏与林琴南、刘师培同为新文化运动顽固的反对派。

在清末民初，辜鸿铭算得一个对外部世界有广泛了解和联系的人物。俄罗斯大作家托尔斯泰与中国人通信的仅两位，辜氏即其中之一。托尔斯泰认为孔子的“恕道”是尊重一切人，可能是受辜氏影响；俄国作家维列萨耶夫在《回忆托尔斯泰》一文中有此猜测。由于辜氏在与外国人交往中显示出学识渊博并有民族气节，

赢得外国人的尊敬。一九二一年，英国作家毛姆访华，会见不少中国名人。毛姆后撰写《中国游记》，书内对见到的中国名人多有讥讽贬抑，而唯一不敢挖苦的，便是辜鸿铭，且反而承认自己被其嘲弄。辜氏的机智、博学和自尊自重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从三十岁到五十多岁间，一直活跃在张之洞幕府，是一个张之洞既十分倚重，又因其桀傲不驯而感到不好驾驭的人物。辜氏对张氏则在尊敬中含有不满，赞扬里寄寓讥讽，可谓毁誉参半。张之洞去世后的第二年（一九一〇），辜著《张文襄幕府记闻》，记述洋务大吏张之洞的若干言行，兼及清末政界文坛的掌故逸事，并随处发表作者本人的评议和感慨。

《张文襄幕府记闻》的主要内容是记载并评论洋务派的活动。作者一方面肯定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大臣”、“功臣”、“儒臣”，特别对于曾国藩的“不排满”即忠于清室，深加赞扬，认为曾氏在镇压了太平天国后仍维护清朝中央政权，其功可与管仲相比^①。另一方面，作者对洋务派又多有不满，批评曾、李等洋务大吏学习西方只限于“铁舰轮船”，“至彼邦学术制度文物，皆不过问”，这种作法终于导致“甲午一役，大局决裂，乃至不可收拾哉”^②。这种议论大体近似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对洋运动失败教训的总结。作者还对统治阶层中那些“盲必称洋人”的崇洋媚外者，给予辛辣的嘲骂^③。与此同时，作者对封建顽固派的一支——清流党的迂腐不通世务也加以讥弹^④，但对清流党的“以维持名教为己任”^⑤又颇为同情。他对曾、李、张以及袁世凯、盛宣怀等洋务派的批评，主要是认为他们重势轻理^⑥，重利轻义^⑦，重货贱德^⑧。可见，辜氏是以传统儒教作为自己的立足点的。

辜氏信守封建纲常，对于彭玉麟的“忠臣”之举推崇备至，

并承认自己在庚子年间写《尊王篇》便是有感于此而作^⑤。但辜氏对朝政的黑暗又极端愤慨，其讥评言词的尖锐，往往达到惊世骇俗的程度。壬寅年（一九〇二年）武昌举行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军界学界大唱“爱国歌”，赞颂清王朝和慈禧本人，辜鸿铭愤愤不平，在筵席上说：“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鼎芬要他作一首爱民歌，辜氏当场朗诵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语出，举座哗然^⑥。辜氏还谴责一些官僚以办“新政”为名欺凌民众，谋取私利^⑦。辜氏又在称赞张之洞廉洁的同时，嘲讽袁世凯、盛宣怀的贪赃行径^⑧。这类对朝廷显要无所顾忌的抨击，显示出辜氏不避权贵的名士派头和社会批判精神。

《张文襄幕府纪闻》笔录了作者与外国人交往的若干情节。一八九八年，日本侯爵伊藤博文来华，与辜氏相会于武昌，辜当面揶揄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的贪婪^⑨。对于某些外国人对中国发表的侮辱性言论，辜氏也给予回敬^⑩。辜氏又十分赞赏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尤其褒扬日本的“文物衣冠犹存汉唐古制，民间礼俗亦多古风”^⑪。

该书的一些篇章还记述了辜氏关于治学、修身的随感，又常常由此引申到对时政的评议，不乏精彩之论。如在引述清初学者潘来的书信后笔锋转至批评曾国藩兴办的“洋务”及张之洞主持的“新政”、“宪政”，认为它们都是不对症的药方，“如一从病之躯”的中国“自服此剂后，非特未见转机，而病乃益将加剧焉，势至今日，恐殆非别拟良方不可”^⑫。

辜鸿铭对时弊的批评虽然颇为犀利，但他却开不出解决这些弊端的正确处方。辜氏在慨叹国家贫弱、朝政腐败之余，只能求救于孔孟教义，把儒学经典视作拯乱世的灵丹妙药，而对康、梁

的社会改革思想则极端仇恨^①。他在《上德宗景皇帝条陈时事书》中，更是全面反对维新变法，将社会改革视作洪水猛兽。辛亥革命后辜氏成为保皇党、复辟派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国粹派，都决非偶然。《读易草堂文集》和《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诸文便早已露出端倪。可谓“草蛇灰线，伏笔于千里之外”。我们今天重新出版这两本集子，一来是为从事近代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提供资料，二来是“立此存照”，让更多的读者从这两部集子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在“古今中西之争”中演化出的一个奇特而复杂的标本。

本书辑《读易草堂文集》和《张文襄幕府纪闻》为一体，名曰《辜鸿铭文集》，原二书中重复的《西洋议院考略》、《英将戈登事略》两篇，只在《读易草堂文集》中保留正文，《张文襄幕府纪闻》仍存目。《读易草堂文集》原署名厦门辜汤生，《张文襄幕府纪闻》原署为汉滨读易者撰。

冯 天 瑜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于湖北大学历史系

①见《清史稿》卷四八六。

②见《张文襄幕府纪闻·弁言》。（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

③见《不拜客》。

④两文分别载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二日和八月十六日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远东评论》。

⑤见《不排满》。

⑥见《曹参代萧何》。

⑦见《孟子改良》、《依样葫芦》、《看招牌》诸篇。

⑧⑨见《权》。

⑩见《清流党》。

⑪见《公利私利》、《外务》诸篇。

⑫见《正视听左右而言他》。

⑬见《虎门轶事》。

⑭见《爱国歌》。

⑮见《马路》。

⑯见《公利私利》、《廉吏不可为》。

⑰见《新算学》。

⑱见《狗屁不通》。

⑲见《横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

⑳见《政体》。

㉑见《清流党》、《贱迹》诸篇。

辜鸿铭小传

辜汤生，字鸿铭，别号“汉滨读易者”，福建厦门人。幼游学英、法、德、奥，以文学冠彼邦，兼自然科学，皆获最高学位。遇有所用，辄出所学以折西人。学成归里，闻塾师讲《论语》、《孟子》，有所入。最耽古圣贤经训，玩索之。笃信孔孟哲学，谓理非西方哲人所及。四部书、骚赋、诗文，无所不览。光绪十一年，张文襄督两广，法、越告警，文襄命知府杨玉书赴闽侦事，回抵香港，汤生适同舟。玉书与谈，回粤与赵凤昌言，谓舟中遇一人，与德人讲论理学，中文甚佳，问姓名为辜汤生云。凤昌言于文襄，邀之来粤，任以邦交诸务。文襄练新军，用德操法，靡德教练官。德皇威廉选上尉来。令用中国顶戴、军服，行半跪拜礼。德军官以未习对。汤生开导，德人帖然。十七年，文襄移督两湖，俄皇储来鄂，俄储内戚希腊世子从。俄兵舰泊汉口，总督以地主礼先访。未几送客，俄随员十人，立舱口左右。汤生语俄储，令向客唱名自通，以尊张督，礼也。旋宴晴川阁，先生以法语通译。席间，俄储、希世子改用俄语问答，谓晚有他约，宣节量。汤生言此餐甚卫生。文襄吸鼻烟，希世子问俄储主人所吸何物？汤生达文襄，以鼻烟递世子，两储大骇。俄储临行，执汤生手，曰当敬待于彼国，以皇冠表赠焉，重宿学也。告文襄曰：各国无此异才。庚子之乱，汤生谓教案激民变，各国当自返，著《尊王篇》。辛丑和议定，汤生领开浚黄浦局事，欲惩西工程师浮冒挖泥费十六万馀两者。领事祖之，谓我辈皆不习工程，宜断由专

门。汤生出曾得奥国工程师文凭，卒办此案。其他忤西人事甚多，然为各国所重。生平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言理财必先爱民，言图功必先律己。严操守，尚气节，诋物质享用者为贱种、醉心西籍者为喜其费解以自欺。严幼陵译《天演论》，汤生曰：“裁者培之，倾者覆之”，古圣八字可了，徒费唇舌。”屢得罪权要，惟文襄爱护之。后入外部，陈奏谓“用小人办外事，其祸更烈”，为项城所忌，而鹿定兴极推崇。文襄告：“何必尔！”汤生答言：“此时非袁氏天下，且待后日。”文襄默然。所著有《读易草堂文集》、《幕府纪闻》，辑《蒙养弦歌》，译《痴汉骑马歌》，英文译著《尊王篇》、《论语》、《中庸》、《孟子》、《孝经》、《春秋大义》，阐发微言，光大名教，欧美几人手一篇。凤昌论交最久，相知最深，言其行叙述于后。予问：“俄馆声势赫然，君与周旋，其气顿下，何故？”汤生曰：“此辈贵介，未尝学问，吾以西方之学人意态对之，挟贵之气自沮。未有不学之人，而能折冲樽俎者。”予谈人力车夫吸纸烟宜节约，汤生曰：“终日劳苦，见坐者吸而生羡，效以自乐，宁非人情？”鄂中万寿节，编《爱国歌》，汤生曰：“更宜有《爱民歌》。”梁节庵曰：“盍编之？”汤生曰：“前四句得之矣：‘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嘉言甚夥，宜分类成书。唐少川告予曰：“世竞言国粹，功在一国，国人共崇之。若鸿铭者，岂非一国之学人乎？吾辈之责也。”可知鸿铭学行，有独到之处矣……

（据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卷二转引

《潜明杂记》）

目 录

前言.....	冯天瑜 (1)
辜鸿铭小传.....	引自《惜阴杂记》 (1)

读易草堂文集

序.....	罗振玉 (1)
--------	---------

内篇

上德宗景皇帝条陈时事书.....	(1)
上湖广总督张书 (丙申)	(7)
《尊王篇》释疑解祸论.....	(9)
义利辨.....	(13)
广学解.....	(16)
《蒙养弦歌》序.....	(19)
《正气集》序.....	(20)

外篇

西洋礼教考略.....	(22)
西洋官制考略.....	(23)
西洋议院考略.....	(24)
意大利国贤妃传 (译意大利古文)	(26)
英将戈登事略.....	(29)

张文襄幕府纪闻

弁言..... (1)

卷上

南京衙门..... (1)

不排满..... (1)

虎门轶事..... (2)

曹参代萧何..... (3)

大臣远略..... (4)

上流人物..... (5)

书生大言..... (5)

五霸罪人..... (7)

清流党..... (7)

孔子教..... (8)

新算学..... (9)

孟子改良..... (10)

践迹..... (10)

务外..... (12)

生子..... (13)

为人..... (14)

公利私利..... (14)

权..... (15)

廉吏不可为..... (16)

爱国歌..... (17)

半部论语	(17)
理财	(19)
王顾左右而言他	(19)
官官商商	(20)
爱官	(20)
亡八蛋	(21)
禁嫖赌	(21)
倒马槽	(23)
贱种	(23)
贵族	(24)
翩翩佳公子	(25)
庸言庸行	(26)
不吹牛屁	(26)
颂词	(27)
马路	(28)
大人有三待	(29)
不問民	(29)

卷下

真御史	(31)
西洋议院考略(存目)	
国会请愿书	(32)
马拉马夫	(32)
夷狄之有君	(33)
烂报纸	(33)
读书人	(34)
督抚学堂	(35)

女子改良	(36)
高等人	(36)
费解	(37)
不解	(37)
狗屁不通	(38)
看画	(38)
华侨	(39)
照像	(39)
发财票	(40)
卖穷	(41)
不枉受穷	(41)
叶君传	(42)
英将戈登事略(存目)	
赠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	(44)
士说	(45)
在德不在辨	(45)
自大	(46)
依样葫芦	(48)
学术	(49)
风俗	(50)
政体	(51)
看招牌	(52)
爱才	(53)
不自贵重	(54)
不拜客	(55)
自强不息	(56)
犹龙	(56)

内篇

上德宗景皇帝^①条陈时事书

具呈外务部员外郎辜鸿铭为应诏陈言，呈清代奏事。窃谓内政宜申成宪，以存纲纪而固邦本；外事宜定规制，以责功实而振国势。近日献策陈事者，皆以为中国处今日之时势，若不变通旧制，则无以立国。然草野之愚以为国之所以不立者，或由外患之所迫，或由内政之不修；独是外患之忧，犹可以为计；若内政不修，则未有能立国者也。惟修内政在存纲纪，夫制度者所以辅立纲纪也，盖凡所以经邦治国，定之者谓之制，行之者谓之政，行政若无定制，则人人可以行其私意，若既有定制则虽人君亦未便专行己意，故制度者非特以条理庶事，亦所以杜绝人欲，杜绝人欲即所以存纲纪也。今制度若屡行更易，则纲纪必损，纲纪既损，邦必坏，邦本既坏又何以立国耶？昔日唐太宗指殿屋谓侍臣曰：

“治天下如建此屋，葺构既成，勿数更易，若易一椽正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盖言法度之不可轻改也。然法度亦有时不可不变也，昔汉承秦统，制度多用秦法。夫秦立国于群雄相争之际，而创制于海内未定之时，法固多简陋、偏刻，致以病民害治，故当是时贤如董仲舒亦有改弦易辙之请，此乃立法不善故有不可不变也。逮有宋之世，欧阳修对仁宗言，谓“今日朝廷有三大弊，一曰不谨号令，二曰不